

# 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汤 一 介

---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文化交流中的双向选择、异地发展、单向流向、“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的态度、以“解释问题”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文化自觉”等等问题, 阐释了 21 世纪将形成新的文化轴心时代, 将出现全球意识观照下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局面, 跨文化和跨学科文化研究将成为 21 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 众多思想群体将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文化交流 文化自觉 全球意识 跨文化研究

作者汤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文化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遇到的是“文化的定义”问题, 据说共有一百多种定义; 其次是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问题; 第三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问题; 第四是对文化思想的诠释问题; 第五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关系问题;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对所有这些问题, 都要在大量掌握材料和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理论研究, 才可能取得有意义的成果。这里只就几个文化问题谈一点看法。

## 一、文化的双向选择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甲、乙两种文化互相选择的问题; 第二方面是把原有本土文化和传入的外来文化作为双方, 在原有本土文化和传入的外来文化之间的双向选择问题。这里我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为例说一点意见。印度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 至东汉中叶, 先有安世高系小乘禅法与中国当时之“道术”(方术) 相依, 以“四大”配比“五行”、“五戒”配比“五常”, 并说“无气”即“五行”即“五蕴”, 《阴持八经注》释“五阴种”谓: “五阴种, 身也。……又如元气, ……元气相含, 升降兴废, 终而复始, 轮转三界, 无有穷极, 故曰种。”此种以“元气”释“五阴”自与佛理相去甚远, 而与当时之“道术”颇有相合之处。后另一支支娄迦谿大乘般若传入, 往往又以玄学解释佛理, 称为“佛玄”, 依附于玄学。自东晋后, 佛教之大小乘的经、律、论大量译成汉文, 两种文化之不同日益显现, 由此发生两种文化之冲突, 如沙门敬不敬王者之问题、“神灭”与“神不灭”问题等等, 但另一方面佛教般若学实又是接着魏晋玄学讲, 所讨论的仍是玄学问题。宋齐之后涅槃学兴起, 至梁大盛, 我们可以发现涅槃学与般若学有着前后相继之关系, 盖因在般若学破除一切世间虚幻的假像之后, “佛性”才得以彰显, 而通

## 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过修行达到“涅槃”才有可能。故梁有关于“佛性”问题之讨论，宝亮列“佛性”问题之学说有十家之多。僧肇之《肇论》虽用的是印度佛教般若学的理论，但所讨论的仍是玄学的问题，“涅槃佛性”问题实已与中国传统的心性学说不无关系。至隋唐后，印度佛教之中国化逐渐兴起，天台之“一心具万法”，华严之“离心之外，更无一法”，禅宗之“识心见性”、“见性成佛”等，上可接先秦之心性学说，下可开启宋明之“心性学说”（或谓“性即理”、或谓“心即理”）。特别是禅宗，不仅吸收了老庄（特别是庄子）的“任自然”之思想，而且也把儒家的“忠孝”思想纳入其体系之中（如契嵩本的《无相论》，宋大慧禅师的“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而较为印度式的佛教宗派唯识宗虽有玄奘大师提倡，但仅仅30余年在中国就不大流行了（近代唯识学一度兴起，又当别论，此不赘述）。这就说明，两种不同文化相遇后，在历史的过程中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还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为什么密教在汉地兴盛了一段时间后衰落，却在西藏、川北等地区与苯教结合而产生了藏传佛教。在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相遇时（特别是有较长历史的文化传统），不仅原有文化要选择其能吸收并加以消化的外来文化，而且外来文化也需要改变原有某些成分，以适应所传入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的要求。这种文化的双向选择不仅在历史上发生过，在当今文化的交流中同样会起作用。这就是说，原有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传入后有一个选择过程，外来文化对所传入的民族的文化也有一个适应和变化的过程。

### 二、文化的异地发展和单向流向

罗素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说：“在往昔，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是超过作为老师的先进国家，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她们的老师。”<sup>①</sup>当然就目前情况看，我们还是在努力向西方学习，因为在许多方面我们大大地落后于西方。至于将来我们能否超过西方，一方面要看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还得看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情况。在历史上，这种文化异地发展的情况所在多有，上面罗素说到的欧洲文化发展的情况就是一例。同样，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印度佛教产生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公元1世纪时传入中国，而到8、9世纪佛教在印度已经衰落，至14世纪几乎湮灭。但8、9世纪正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印度佛教已经逐渐中国化，吸收着中国文化，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和禅宗。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了发扬光大，并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越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这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因为甲种文化移植到乙种文化中，往往会对甲种文化增加某些新的因素，这种新因素或者是甲种文化原来没有的，或者是在甲种文化中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新的文化因素加入甲种文化，从而使甲种文化在乙种文化中得到发展。甲种文化之所以没有能在原地继续发展，当然原因会很多（如外族入侵、战乱等等），但这种文化不能、或者没有在原地增加什么新的因素，应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说文化存在着异地发展的问题。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文化的双向选择问题，这可以分两个问题来看。一是甲、乙两种文化互相选择的问题。这里我想讲讲文化的单向流向问题。我们知道，印度佛教大量传入中国，佛经

大部分都被译成汉文,据唐朝白居易(居易)的《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论经藏后记》载,这个寺庙所藏佛经就有 5058 卷之多。可是中国文化(如儒家、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并没有相应地传到印度。据《旧唐书》、《新唐书》、《宋高僧传·玄奘传》等记载,《道德经》曾被译成梵文,但据季羨林先生说:“《道德经》是否传至印度,则我们毫无根据来肯定或否定”<sup>①</sup>。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道德经》的梵文本没有对印度文化发生什么影响,并且早已不存在了。这就说明,文化之间的交流可能存在一种单向的流向情况,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状态可能更为常见。今天中国正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各国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大量地吸收中国文化,这已是不争之事实。至于印度在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吸收中国文化,我想其原因和宗教有关,因为宗教一般都有排他性。而中国文化则有较强的包容性,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国古代士大夫其立身行事往往是依儒家,但他们可以信仰佛教,或者信道教,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大概是不多见的。当然文化的单向流向的原因可能很复杂,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 三、文化上的“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

在鲁迅《拿来主义》一文中最后有这样一段:“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或者使用,或者存放,或者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新主人,文艺不能自成新文艺。”<sup>②</sup>鲁迅主张“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sup>③</sup>。现在我们仍然要自己来拿,把西方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资源按照我们实现现代化要求统统拿来,作为养料,建设我们的现代新文化。鲁迅在这篇短文中也谈到了“送去”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过去(清朝以及民初)我们的“送去”,常常是把一些“古董”和自然资源等等作为“礼物”送了出去,所谓“发扬国光”,无非是向别国“磕头贺喜”罢了,这种“送去”和真正的文化交流无关。

今天我们要提倡鲁迅的“拿来主义”,只有善于和勇于把西方的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充分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不是以狭隘的实用主义态度)拿进来,才能使我们自身的文化得到更新。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作为“他者”来观照我们自己的文化,才能全面看见自己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关于引进和如何引进外来文化的问题,最近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里我打算多谈一点“送去主义”的问题。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有丰富的文化,但从历史上看,我们很少自觉、主动地把我国的优秀文化送出去。前面已说到,我们在吸取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并没有自觉、主动地把中国文化相应地传到印度去,而且自隋唐以来,朝鲜半岛和日本虽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大,但多半是他们的留学生或学问僧到中国来“取经”,从而促进了他们的文化发展,但这大多不是我们自觉地、主动地送去的。到 16 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一方面把西方的宗教、哲学、艺术、科学技术带进中国,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并在那里的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例如当时伏尔泰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sup>④</sup>,莱布尼兹甚至说:“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令人类赞赏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sup>⑤</sup>,但是他们

① 季羨林:《学海泛槎——季羨林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4—255 页。

②③ 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21—422、422 页。

④ 《伏尔泰书信集》中有一位年轻人理查德(Reichard)给伏尔泰的信中说:“您是欧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转引自孟华:《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 页。

⑤ 庞景仁译:《莱布尼兹致闵明我的两封信》,《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 年第 3 期、1982 年第 1—2 期。

## 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几乎都不是由中国人所传授的,而大多是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中得到的。19世纪末以来,中国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许多方面从西方学了不少东西,然而在向西方国家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虽然也有所谓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但大多是歌舞、杂技、舞龙灯、踩高跷、扭秧歌或者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除了这些之外,难道中国文化就没有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重大问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吗?现在大家都承认“和平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要解决的主题。“和平共处”就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也就是要解决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共同持续的“发展”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重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儒家(孔子)的“仁学”和道家(老子)的“无为”思想,无疑对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从某个方面也可以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源;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崇尚自然”,也无疑对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某个方面可以提供有意义的资源<sup>①</sup>。但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给以现代的诠释,使之适合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时,我们也还得清醒地看到任何思想都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只能解决某一部分问题,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是没有的,它很可能是“伪科学”。

### 四、关于“文化自觉”问题

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问题,也是2001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21世纪中华文化世纪论坛”第二次会议的主题:《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1998年我曾在《学人》杂志上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sup>②</sup>。几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共写了五篇文章,都收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和而不同》小书中。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现在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等等,大多用的是西方解释学(或译为诠释学、阐释学,都是由Hermeneutics翻译来的)。西方的解释问题主要是由解释《圣经》而来,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漫长的酝酿过程。19世纪德国哲学家兼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9—1834)和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狄尔泰(W. Dilthey, 1835—1911)自觉地把“解释问题”作为一门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使之成为一门有理论体系的学科。然而中国有比西方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例如,《左传》对《春秋》的解释大体上是在公元前400年前后;《易传》中的《系辞》对《易经》的解释、《墨子》中的《经说》对《墨经》的解释、《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对《老子》的解释,都在公元200年之前。我们有这样长期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但是我们没有自觉地把“解释问题”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因此我提出了“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希望对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作一理论上的梳理,看看是否可以创建与西方解释学有所不同的“中国解释学”<sup>③</sup>。

从历史上看,每门学科(学问)的建立,都是由于自觉地把所研究的对象作理论上的梳理,以形成一套理论和方法。一门学科的建立,当然在它之前已经有或长或短的“问题的积累”、“资料的积累”、“思想的积累”等等历史,这大概只能说是这门学科的“前史”。人们通常认为“比较文学”是在19世纪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其实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文学的比较”早就有了,例如《文心雕龙·明诗》就对诗人作品以及不同时代的诗风作了比较说明,其中有一句:“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山水方滋。”这里比较了南朝与魏晋时诗风的变化。在魏

① 参见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定位》,《跨文化对话》第6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0页。

② 参见汤一介:《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第13期,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③ 参见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83—90页。

晋时期往往诗是“玄言诗”，而到刘宋时期诗风渐由“玄言诗”变为“山水诗”，这样诗就更接近自然了。因此，并不是有了“文学的比较”就有了“比较文学”，“文学的比较”只是“比较文学”所必须的材料。李达三教授说：“作为一门学科而言，‘比较文学’在法国，直到19世纪30—40年代方告成熟。以此而言，在法国或其他任何地方，安培尔(1800—1864)或威尔曼(1790—1867)可被认为真正构想完整的‘比较文学’。”<sup>①</sup>在中国，把“文学的比较问题”作为一门“学”自觉地研究，是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西方“比较文学”的影响才开始建立的。同样，在中外历史上早有考古发掘或者古物鉴定等等，但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所说，西方“考古学”的“萌芽期”约从1760年至1840年，而中国的“考古学”是晚到20世纪20年代，才由裴文中、李济等先生建立的。对中国哲学，我也有一个想法。我认为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固然不对，但是在西方哲学传入之前，中国还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甚至“史学”等分离出来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而“中国哲学思想”往往是在“经学”或“子学”中进行研究的。“哲学”一词是日本哲学家西周(1829—1905)借用汉字“哲”、“学”两字指称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学说Philosophy，后由中国学者黄遵宪(1818—1905)将这一名称介绍到中国来，为中国学者所接受。这就是说，中国学者受西方哲学的影响，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等分离出来，自觉地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学问)进行研究，不仅发现它的丰富性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已经建立起“中国哲学”，并且揭示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之所在。概括地说，西方哲学重在追求建立知识系统，而中国哲学则重在追求精神境界<sup>②</sup>。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一种“学”(学科，学理，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对其研究对象(例如“解释问题”、“文学的比较问题”等等)有了理论与方法上的自觉，即自觉地把它要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来研究，并能为社会普遍所接受的有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任何学科的研究大体都是如此，“文化的自觉”大概也应是如此。比如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我们必须自觉地把中国文化作为对象，进行系统的、有创造性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才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才可以知道中国文化的优缺点，才可以自觉发掘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才可以有目的、积极地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以适应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 五、关于文化消亡和文化共存问题

只要有类就有人类文化，只要有不同的民族就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但是并不是地球上所有的民族都能保存下来，因而许多民族文化也会在历史长河中消失；甚至有些民族虽然存在，但在历史长河中其文化却消失了，这种情况在历史中和现实中都存在。文化消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因天灾，有的因人祸；有的是由其内在的原因，有的是由于外在的原因。对我们不必多讨论。

我想说的是，当今有几种大文化不会在短时期消失，甚至可以说在很长的时期中都不会消失，这就是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这几种文化不仅有很长的历史，而且每种文化所影响的人口都在10亿以上。我们知道，自二战以后，西方殖民体系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的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从各方面自觉地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独立文化正是其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21世纪将形成

① 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85页。

② 参见汤一介：《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 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个文化上的新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孔子、老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主要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在这本书中他还提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sup>①</sup>历史曾经证明雅斯贝尔斯的论断的正确。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源头古希腊,由此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从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本土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当今,从众多方面看都可以说会出现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上述四种大的文化传统将会在确认自己文化内在精神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其他文化来营养自己,而形成文化的新的飞跃。

新的轴心时代与公元前五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有鲜明的不同,概括起来至少有三点:

1. 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世界联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原先的“轴心时代”的几种文化在初创时虽互相并无影响,但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却都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说,欧洲文化在17世纪以前曾吸收了多种文化因素,到17、18世纪,西方又曾吸收过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它能不断吸收不同文化的某些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同样,中国文化也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得到发展的。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诸多方面的发展,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发扬光大,并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而且在朝鲜和日本又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而形成各有特色的佛教文化。近代中国文化又在西方文化的东渐下,不断地吸收西方文化,更新自己的文化。回顾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各种流派都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或仍然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显然,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影响,构成了今日人类社会的文化宝库。新的“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必将是沿着这种已经形成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吸收的势态向前发展,因此各种文化必将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得到发展。这就和两千多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文化有着鲜明的不同。

2. 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由于世界联成一片,每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此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将会大大地发展起来。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有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看,也就是说从“他者”看,也许会更全面地认识这种文化的特点,因而当前跨文化研究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热门。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文化,已逐渐为中外广大学术界所接受,并为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各个学科之间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今日的科学已大大不同于西方18世纪的情况了,当前科学已打破原先的分科状

<sup>①</sup> 雅斯贝尔斯:《自轴心期以来的世界历史结构》,载《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译文据原著稍有改动)。

况,发展出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但正因为如此,原来的学科划分越来越模糊了:本来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化学就是化学,现在既有物理化学,又有化学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之间原有的界限被打破了。不仅如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例如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运用了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因此就目前情况看,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渗透的情况。我们可以预见,在 21 世纪哪种传统文化最能自觉地推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整合,它就将会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力。21 世纪的新“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世纪,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世纪,这大大不同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那个“轴心时代”了。

3. 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正因为当今社会发展比古代快得多,思想更替日新月异,并且是在各种文化和各个学科互相影响中发展着,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因此就没有可能出现“独来独往”的大思想家。当今思想界面对的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而是面对全世界,它就不可能不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某些因素,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真正有成就的思想家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在西方,近一、二百年来各种思潮不断变换,其各领风骚最多也就是几十年,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有哪种思想能把西方流行的众多派别整合起来。而中国百多年来基本上是处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是处在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个文化多元并存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各种学说、各种流派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处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之中,但我们还没有能如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那样,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基础上形成新的现代的中国文化。但在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分野越来越明显,逐渐形成了若干学术小团体,这些学术小团体大概都只是“一家之言”。展望 21 世纪,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出现适应中国现代社会要求的不同学术派别,但大概也不会产生一统天下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说,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不断变换,无论中外大概都不可能再出现像柏拉图、孔子、释迦牟尼等等那样代表着一种文化传统并影响了两千多年、今后仍然会发生重大影响的伟大思想家。那种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众多的思想群体的合力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多元文化所要求的。我认为当前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移也许和这种情况不无关系。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传统的慢节奏的精英文化已不适应人们感情和精神的需求,因此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出大众化趋向,为满足人们这种快节奏的感情和精神上的需要,思想文化也逐渐趋向简明和通俗。我想,这也是不会出现像已影响人类文化两千多年、今后仍然会长期发生影响的孔子、老子、柏拉图、释迦牟尼等“圣人”的原因之一吧!可以预见,21 世纪的思想文化也许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世纪。

以上三点只是我的看法,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特点。上述四种文化传统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的形势下,将会长期共同存在,并将视其更新自身能力的大小,来决定对当今人类社会贡献的大小。因此在新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必须充分发扬其内在的精神活力,排除其过时的和错误的部分,大力吸收西方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并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使之适应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需求,“苟日新,又日新”,这样中国文化不仅会得以复兴,而且将会对人类社会作出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第一)